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杨剑龙 王 童

〔摘 要〕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关键词〕后革命时代;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叙事类型

〔作者简介〕杨剑龙,1952年生,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童,1987年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5-0192-05

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后革命”时代,认为“革命的绝对正确被建设的需要所代替,国家的社会政治氛围渐渐由现实主义、平民主义、务实哲学与分析思维所塑造,中国进入了一个正正然的后革命时代”^{〔1〕}。在谈到“后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时,陶东风指出“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基本政体和国体,但是却放弃了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动员、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革命文化’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复兴,而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和挪用,因此准确地说是‘后革命文化’——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文化,而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2〕}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后革命文化也呈现出新形态,影响与左右着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

在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不同叙事类型。在延续《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等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中,史诗类的小说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史诗类小说以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为背景,在展现曲折坎坷的革命历程中勾勒刻画革命领袖与人物形象,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氛围中展现出革命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黄亚洲的《日出东方》以“五四”运动到井冈山会师十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形象化地再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坎坷历程,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创始人的生动形象,在遵

循历史史实的基础上,生动描绘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赵万里的《西柏坡》以1947年3月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为背景,全景式地描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过程。小说在土地改革、三大战役、七届二中全会、夺取政权等顺时序的结构中,刻画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性格的魅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张惟的《血色黎明》以“五四”至抗战前夕闽西苏区为背景,囊括了南昌起义、龙岩暴动、井冈山会师、古田会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刻画了罗明、邓子恢、张鼎丞、陈丕显、杨成武等诸多革命人士,呈现出艰苦卓绝革命斗争中的风云变幻与革命信念。

在摆脱了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后,在摆脱了以阶级斗争视阈观照革命历史的方式后,一些作家以反省历史反思革命的角度重新观照与描写革命历史,出现了一些反思类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或从人性的视角分析革命历程中的曲折与坎坷,或从怀疑的眼光分析历史事件中的复杂与迷惘,呈现出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迥异的色彩。李洱的《花腔》以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葛任生死之谜的探究为主要情节,通过医生白圣韬、劳改犯赵耀庆、法学家范继槐的讲述,呈现了东渡扶桑学医、回国京沪任教、投奔苏区、参加长征颠沛流离的葛任坎坷经历和悲剧命运,以个人在历史动荡中命运的不同叙述,形成了对于历史与英雄的嘲弄与颠覆。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通过孙女“我”的口吻叙写了“爷爷”集英雄与土匪、英勇无畏与寡廉鲜耻于一身的





革命者形象,他为革命卧底敌营、护送情报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对与他共同生活的三位女性却只有欲望发泄却没有任何真情,从历史与人性角度对于英雄与英雄主义进行反思。柳建伟的《爱在战火纷飞时》刻画了出身名门望族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张世杰的形象,他在敌占区出生入死与日军、伪军、汉奸和国民党周旋,为革命根据地运送战略物资,他在与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中,再三违反革命纪律,解放后他放弃了将军的授衔,回到家乡当小学校长。反思类小说或颠覆历史,或反思英雄,或回眸革命,呈现出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迥异的色彩。

在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的作品在革命历史的背景中叙写主人公坎坷跌宕的命运,呈现出鲜明的传奇色彩。都梁的小说《亮剑》叙写了革命将领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任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抗击日寇到“文革”期间受迫害自杀,在这个身经百战性格暴烈的草莽英雄身上,充满着传奇色彩,他多次抗命、四次降级、多次复出,却洋溢着宁折不弯铮铮铁骨的英雄气概。朱秀海的《音乐会》叙写朝鲜抗日志士携儿女流亡中国的故事,其妻儿双双被日本人虐杀,为了遵循保护烈士遗孤英子的诺言,游击队员们前赴后继先后壮烈牺牲,英子成为游击队最后一名女战士。傅建文的《长征谣》以红军警卫连连长秋水伤愈追赶长征部队、妻子栀子千里寻夫的故事,形象地再现了坚苦卓绝的长征历程,在坚贞爱情与坚定信念中呈现出传奇色彩。传奇类的小说以主人公的人生传奇为主要叙事内容,革命历史背景的铺置使作品具有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可读性。

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以地下党谍战为题材的作品成为新世纪创作的亮点。高杰贤的《拂晓长春》以1948年解放长春的战役为背景,却以隐蔽在茂昌大药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忘我奉献、奋斗牺牲为主线,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策反、给围城大军运送稀缺药品、乔装打扮传递情报、护送烈士遗孤出城,在扑朔迷离云谲波诡的谍战故事中,呈现出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异彩纷呈。都梁的《狼烟北平》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北平为背景,围绕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合作与较量,在秘密的特务工作、惊险的刺杀锄奸、浪漫的爱情故事、惨烈的严刑审讯等情节中,展示谍战工作的残酷惊险。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以江淮地区抗日斗争为背景。新四军高级将领沈轩轾临危受命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他以其绅士风度和家族力量赢得日军

驻屯军司令松冈大佐的信任,担任了陆安州汉奸政权的市长,他分化瓦解汉奸武装力量,统一指挥陆安州的国民党军独立旅、新四军七支队、地方武装以及民间抗日力量,同松冈联队展开殊死决战并将其全歼。谍战类小说往往在敌我阵营难以辨别中,将共产党人地下斗争的艰苦卓绝、惊心动魄写得一波三折触目惊心。

我们将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分为史诗类、反思类、传奇类、谍战类,其实这些作品的划分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只不过某部作品更注重某些方面的叙写罢了,从而我们可以观照分析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的某些现象与症候。

二

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单纯注重史诗性不同,与90年代新历史小说主观勾兑历史迥异,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虽然史诗类作品仍然是创作的基本类型,但是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出某些新的色彩。

(一)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革命历史背景中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以描写革命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和以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理想主义为基调的革命历史小说,常常以正剧或悲剧的形式出现,作为正面主人公往往具有英雄人物的光明磊落智勇双全的优秀品质,《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的刚毅勇猛冷静果断,《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的随机应变智勇双全,《红岩》中的许云峰的赴汤蹈火正气凛然,《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的坚韧不拔有勇有谋,都呈现出人物形象的高大辉煌,但一定程度也显露出人物性格刻画的简单化与平面化。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品克服了以往小说注重英雄形象刻画的简单化平面化,而强调人物心理性格内在的复杂与丰富,有时突出了人性的生动与深刻。在刻画共产党领袖人物时,与以往小说很少关注领袖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不同,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常常对于他们的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予以关注,如《西柏坡》中描写毛泽东对女儿李讷的舐犊深情、与毛岸英的父子之情,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山村缔结情缘、刘少奇制止了贫农团批斗地主的过激举动等,都呈现了领袖性格的丰富与丰满。在反思类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在颠覆历史回眸革命中,尤其注重人物性格的复杂与丰富,



使英雄人物的刻画更趋于立体化。项小米《英雄无语》中的英雄“爷爷”是一个忠于革命无所畏惧的英雄,他卧底敌营出生入死,化妆跟踪刺杀叛徒,护送情报舍生忘死,“面对组织他是那样的忠诚英勇,信守诺言,从不讲任何代价和条件,即使组织叫他赴死,他也决不会皱一下眉头”。但是他对待先后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位女性,却呈现出粗暴愚昧封建暴君的色彩,“大山给了他勇猛、顽固、粗犷,同时也给了他愚昧、粗暴和简单”,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丰富。都梁《亮剑》中的李云龙是一位驰骋战场身经百战的英雄,他正直刚烈铁骨铮铮,“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但是 he 有着农民的狡黠与自私,他枪毙战俘我行我素,满口粗话性情暴烈,与英雄人物的正面形象构成了某些反差。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刻画中,努力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注重英雄人物的七情六欲,往往从人性深处审视人物的复杂性,使人物呈现出与传统英雄人物迥异的色彩。

(二)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审视革命历史时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格外突出,革命中充满着阴谋虐杀,历史里隐藏着蒙骗愚昧。高杰贤《拂晓长春》里国共两军对垒时长春被围困,茂昌大药行中共地下工作者迎接长春解放前夕艰苦卓绝的斗争,并非如以往作品中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智勇双全料事如神,却在难以预料的斗争中常常遭遇不测:企图调虎离山的假情报,却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线索,导致不少同志被捕;截获了敌人要杀害战友的秘密情报,企图从屠刀下解救战友,却遭遇更大的损失;对于露出蛛丝马迹的内奸,却未能追查到底,以至放虎归山留下致命隐患。革命充满着血腥与危机,共产党人是人而非神,革命的复杂性偶然性被生动地写出。李洱的《花腔》通过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三者的讲述,探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葛任生死之谜,不同人物众说纷纭的叙述,充满着矛盾与悖论、混乱与驳杂,使这桩历史谜案更为扑朔迷离,是对于革命历史的某种颠覆与怀疑,“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描写江淮地区的抗日斗争,却分别描写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完全颠覆了以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念,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也将其复杂性偶然性写出:刻画主人公沈轩辕时,通过抗日战士王凌霄对“死去”

情人的思念、共产党部队政治部主任彭伊枫对红军教员的追述、日本军队对神秘总指挥人物的寻觅,刻画分别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特派员、高级将领、警备司令、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书记、伪陆安州的市长的沈轩辕。在描画汉奸时,分别刻画不同的形象,如“皇协军”师长宫林济虽置身汉奸队伍中,但内心充满着民族耻辱感,最终率领部队走上抗日之路;汉奸排长李伯勇内心也充满强烈自卑与耻辱感,后来投身抗日阵营。小说在重新阐释革命与历史中,也重新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

(三)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继承叙事传统时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

在谈到“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时,有学者指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资源在当下语境中的复现,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延续了旧有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了现实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革命性的合法起源;另一方面,它又小心翼翼地清除或淡化了那些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模式与现实秩序不相融的部分(对革命理想性的追求,阶级平等政治诉求)。”⁽³⁾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革命历史文学创作,既延续了“十七年”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传统,又淡化甚至颠覆了某些与现实秩序不相融的部分,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性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方面题材创作的多样化。

作为中央特科人员项与年的孙女、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女儿的项小米,她以其对于先辈生活与经历的熟悉,在《英雄无语》中叙写了“爷爷”的故事。项小米谈到涉及特科、地下工作、文革、爱情等非常纠结的内容时说“你没有机会反复写,你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首先得对得起你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人,如果为了避免踏雷或者迎合什么,那还不如不写。”⁽⁴⁾项小米以其对于先辈生活的熟悉、对于那些事与人的良心,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其独特个性。17岁入伍的朱秀海对于部队生活情有独钟,创作了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他的创作常常在激烈的战争场景中叙写人物命运,在战争的逆境与困境中剖析与拷问人性,从而呈现出其对于战争与人的独特思考。曾服役于坦克部队的都梁,复员后曾做过教师、公务员、公司经理、石油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等,创作了《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等作品,他的作品大多以具有阳刚色彩的男性为主角,耿直、倔强、善良、义气,在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呈现出民族刚





性性格的塑造。1978年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徐贵祥,有比较丰富的军旅生活和较好的文学修养,创作了《马上天下》、《仰角》、《历史的天空》、《明天的战争》、《八月桂花遍地开》等小说,他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刻画性格鲜明的人物,在困境与绝境中凸显人物性格,崇尚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在人物命运的沉浮中具有独特的感染力。

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注重刻画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推进了“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丰富了新世纪文坛的文学创作。

三

在评说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时,我们也看到了存在的某些缺憾与不足。雷达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指出,“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5)。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着某些缺憾。

(一)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影视改编的影响下,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影视与小说创作的互动成为读图时代的现象,小说因改编为影视作品而走红畅销,影视因小说的畅销而扩大收视率。在新世纪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受到青睐,《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年内播放6次,“全国有101个频道在放《幸福像花儿一样》,有50多个频道同时在播《暗算》,《亮剑》在江西卫视回放7次,在重庆台播了8次,每次收视率都高于该时段其他剧目的全年平均收视率”(6)。由于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热播,对于此类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起了某种推动作用。

由于影视剧在传播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影响,一些小说家在构思与创作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此方面的左右,这使小说多了影视剧色彩,而少了小说意味。如在增强人物对话中淡化了对于人物心理心态的描写。影视艺术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小说艺术需要读者通过想象重构小说境界。受到影视艺术的影响,一些小说往往出现大段的人物对话。如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开篇描写在苏鲁皖长官部战区司令李长官命沈轩任六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李长官与沈轩一

问一答的对话,《拂晓长春》开篇在长春被围食物匮乏背景中宝山要父母收留静美的对话,都呈现出电视剧台词的色彩,而少了小说描写的生动与光彩。赵万里的《西柏坡》过多的人物对话,影响了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因此有读者评价说“就体裁而论,此书更接近于电影文学剧本,而不是小说。”(7)受到影视艺术的影响,在注重场景设置中淡化了对于小说起承转合的层次感。影视作为综合性艺术,其编剧有注重场景设置的特点,将人物与情节置于某个特定的场景中,形成电视剧某些特征。如《亮剑》第一章以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为多弄些手榴弹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家坡阵地上李云龙率独立团歼灭山崎大队两个场景构成,呈现出电视剧的场景特征。如傅建文的《长征谣》以长征经过的毛儿盖、界首、两河口、界首、卢定等场景转换,形成小说的基本结构。高杰贤的《拂晓长春》第一部分基本以场景构成小说叙事方式:般若寺门口,高太太收留一乞儿;乞儿家里,高宝山将乞儿送回;高家客厅,高家将艺专毕业的静美留下;高宝山房间,宝山与静美心心相印;高家屋舍,搜粮队搜走八百多斤粮食……长篇小说叙事的场景化,形成了小说结构的电视剧特征。

(二)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市场经济冲击了中国文学本应坚守的“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8),动摇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应有的庄严态度,降低了作品的原创能力和经典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畸形的复制能力”(9)和以“俗”取悦读者的迎合姿态。进入新世纪,随着市场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增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媚俗倾向,在将诸多言情、谍战、传奇等通俗因素融入作品中时,往往呈现出某种复制的色彩,甚至出现了粗鄙化、庸俗化的意味,缺少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典化的叙述。

谍战工作是革命工作中最具危险和挑战的一种,对谍战故事的合理想象和叙写,会使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但是想象不同于编造,叙写不等于夸大,一味猎奇求险的谍战叙事有时只会损害革命历史小说的精神品质,使小说成为情节刺激而精神空虚的庸俗读物。《拂晓长春》叙述周玉璞、周西同、瘸舅、金子明、李云凡等中共地下党员在长春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谍战壮举:牺牲自己解救抢粮的饥民、在国民党内部策反、给围城



大军运送稀缺药品、乔装打扮传递情报、舍身营救党外进步人士、护送烈士遗孤出城、错遭组织关押依然无怨无悔……地下党员们忘我牺牲的壮举令人震撼,白色恐怖下的暗战使人心惊。然而小说很像一个通俗的长篇故事,惊险刺激的谍战叙事中缺少人物内心的刻画,缺少细节、环境的描绘,连篇累牍的谍战情节缺乏疏密有致的安排,较少精神情感的升华。从某种角度说,云诡波谲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中“独霸天下”,通俗化“说书式”的谍战叙事弱化了革命历史小说理应具有的革命精神,一味求奇求险、惊心动魄的谍战情节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小说通俗有余而意蕴不足、曲折跌宕而有时经不住推敲,关注通俗化的表达中却少了耐人咀嚼的经典化的叙述。

(三)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后革命语境制约下,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新世纪以来的后革命语境拒绝革命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视阈,注重借用革命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日常化叙事,带有一种将理想主义世俗化、甚至只重“肉身”忽略精神的倾向。在这种后革命语境制约下,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在整体上更注重回归日常化的表述,往往更注重将革命者或英雄人物作为血肉丰满的“人”来写,突出人物日常的七情六欲,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物崇高精神境界的叙写,更缺乏对于精神境界的超越,以至于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更多了通俗文学的色彩,而少了精英文学的追求。

《长征谣》以日常化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叙述,唱响了一曲优美的“长征”歌谣。伤愈的红军警卫连连长秋水与被红军俘虏释放的瑞士传教士循原路返回贵州,在苏区留守的秋水之妻栀子雇佣乔弹匠沿长征路线千里寻夫,年轻的乔弹匠痴迷于栀子的美貌,但栀子的坚贞善良感动了弹匠,经历了坎坷波折的夫妇最终同时到达遵义,但茫茫人海相遇绝非易事。小说以日常化的叙述生动再现了

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以传奇浪漫的笔触表现了秋水与栀子的坚贞爱情。然而小说执著的日常化叙事弱化了小说的精神追求,大量琐碎平庸的生活细节冲淡了小说的革命气息。如,乔弹匠对栀子“动手动脚”的细节、乔弹匠逛窑子发泄性欲的情节等,多少给小说抹上了庸俗色彩,弱化了作品的精神力度。《狼烟北平》以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狼烟滚滚的北平为背景,围绕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的合作与较量展开叙事,展现深明大义的地下工作者的奋斗与牺牲。对于这段充满危险艰难的革命牺牲史,作家都梁过于注重人物的七情六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物崇高精神的叙写,如,过度放大人物欲望的叙写使地下党员方景林几乎成为一个自由散漫、爱情至上的“问题”党员,方景林第一次与年轻貌美的罗梦云接头就提出“以后除了工作上的事,我还可以再约你吗”的要求,此后屡次借接头之机与梦云谈情说爱。作家似乎常常将爱情故事“塞进”革命中,让方景林与罗梦云的秘密接头变为“幽会”,过度的日常叙事损害了小说中革命者形象,革命精神被婀娜、妙曼的肉身所遮挡,一些缺乏精神超越的日常化表述成为作品的败笔。

(参考文献)

- (1) 任剑涛《后革命与公共文化的兴起——〈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前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 (2) 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 (3) 刘复生《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 (4) 项小米《今天和昨天》,《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2期。
- (5) [8][9] 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
- (6) 汪秋萍《军旅电视剧激情燃烧的背后》,《新华日报》2007年5月14日。
- (7) 牟海静《我谈历史小说的文学味——读〈西柏坡〉》,董乡文学网2010年9月26日。

【责任编辑:刘瑞弘】

